

NANFANG YUYANXUE

南方语言学

广东省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甘子恩 主编

第十六辑





NANFANG YUYANXUE

南方语言学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甘于恩 主编

本书出版获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

第十六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语言学. 第十六辑 / 甘于恩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20. 8

ISBN 978-7-5192-7728-4

I. ①南… II. ①甘…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6970号

书 名 南方语言学(第十六辑)
NANFANG YUYANXUE (DI SHILIU JI)

主 编 甘于恩

责任编辑 魏志华 李 婷

装帧设计 林穗晓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3623 84184026 84459579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467千

版 次 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7728-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咨询、投稿: 020-34201910 weilai21@126.com

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名单

学术顾问

詹伯慧 李如龙 张振兴 许宝华 邢福义 邵敬敏 潘悟云 张双庆
鲍厚星 张洪年 单周尧 刘村汉 林立芳 钱曾怡 温端政 平山久雄
陆镜光

主任委员

麦耘

委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志耘 甘于恩 李蓝 林伦伦 麦耘 邵慧君 万波 汪国胜
伍巍 张敏 张屏生 庄初升

《南方语言学》编辑组

名誉主编

詹伯慧

主编

甘于恩

编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晓锦 范俊军 甘于恩 高然 刘新中 彭小川 邵宜 伍巍

编辑

侯兴泉 曾建生 赵越 李菲 焦磊 李林欣

目 录

特 稿

- 新型客家话、旧型客家话与早期南方高地汉语方言……………柯蔚南 著 刘镇发 译 (1)
- 关于语体修辞教学的思考……………孟建安 (34)

汉语方言研究

- 湖北贺胜桥镇方言韵母特点探究——基于老中青三代方言的调查……………但 锐 刘海波 (42)
- “X在”式复合词的词汇化和主观化——兼谈其在安顺汉语方言中的用法……………叶晓芬 侯兴泉 (53)
- 清远连山话浊上的今读及演变……………易惠媚 (62)

地理语言学

- グロットグラム (Glottogram) 的原理及其应用……………李仲氏 (67)

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

- 浙江景宁畲话的声调……………章 策 (77)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 美国华人有关牲畜表述的研究……………陈晓锦 李颖慧 (89)
- 印尼棉兰美达村客家话中的新增词……………吴忠伟 (101)
- 马来西亚亚庇客家华人语言生活调查报告……………陈嘉乐 (107)

词汇学研究

- 粤方言词源理据考释——以“鬼马”“盏鬼”等词为例……………柯雅婷 (117)

语法学与方言语法

- “根本”的句法分布与词类组合研究……………吴梦荃 (122)
- 和平(彭寨)客家方言中的“咩”……………陈洲钰 王茂林 (132)

汉语史研究

- 清末民国几种粤方言韵图述略……………周赛华 (141)
-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的音系与语法

| | | |
|-----------------------------|-----|-------|
| ——兼与近现代西班牙传教士闽方言汉语教材比较····· | 金 美 | (153) |
| 颜师古《汉书注》古今字注释方式探析····· | 何玉兰 | (169) |
| 《蜀语》方言词词外理据研究····· | 傅湘云 | (176) |
| 秦观词用韵考····· | 杨咏雅 | (184) |
| 《诗经》“中+名词”结构浅析····· | 张星星 | (192) |
| 八十年来的汉字谐声与古音学述评及研究方法探索····· | 董国华 | (198) |

语言应用研究

| | | |
|------------------------------|-----------------|-------|
| 粤语水平测试的应用需求暨纲要及等级标准制定研究····· | 彭咏梅 甘于恩 | (203) |
| 来宾普通话卷舌元音的实验研究····· | 邓宏丽 陈 梅 罗荣昌 党雯凤 | (210) |
| 目的论视角下店名广告语语音转喻的翻译研究····· | 郑 伟 | (227) |

方言与文学

| | | |
|-------------------------|-----|-------|
| 从方言剧本《抓壮丁》看四川方言疑问句····· | 周 炜 | (232) |
|-------------------------|-----|-------|

动 态

| | | |
|--------------------------------------|-----|-------|
|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获教育部嘉奖····· | 燕 辉 | (242) |
|--------------------------------------|-----|-------|

资 料

| | | |
|----------------------|-----|-------|
| 《南方语言学》(第十五辑)目录····· | 晓 珊 | (243) |
|----------------------|-----|-------|

Table of Content

Special Articles

- Commen Neo-Hakka:A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W. South Coblin(*Translated by Lau Chan Fat*) (1)
On the Teaching of Stylistic Rhetoric *Meng Jian'an* (34)

Chinese Dialects

-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istics of Syallables in He Sheng Qiao Dialect—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Dialects Used By Three Generations..... *Dan Rui & Liu Haibo* (42)
Lex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Compound Words in the Form of “X +Zai (在)” —On its usage in
Anshun Chinese Dialect..... *Ye Xiaofen & Hou Xingquan* (53)
Pronunciations and Evolution of MC Shangsheng Tone with Voiced and Sonorant Initials in Lianshan
Dialect in Qingyuan *Yi Huimei* (62)

Geolinguistics

- Principles of Glottogra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Geolinguistics *Li Zhongmin* (67)

Chinese Dialects & Minority Languages

- The Tones of Jingning She Dialect,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Ce* (77)

Studies of Oversea Chinese Dialects

- A Study on the Expression of Livestock by Chinese Americans..... *Chen Xiaojin & Li Yinghui* (89)
New Words in Hakka Dialect of Meida Village, Medan City, Indonesia *Wu Zhongwei* (101)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Language Situation of Hakka in Kota Kinabalu, Malaysia *Chen Jiale* (107)

Lexics and Lexicology

- A Study of Etymological Motivation of Yue Dialect: With Guima (鬼马) and Zhan-gui (盏鬼) as Examples
..... *Ke Yating* (117)

Syntax and Dialectal Grammar

- A Study on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d Word Combination of “Genben” (根本) *Wu Mengquan* (122)
On the function of “me” in Pengzhai Heping Hakka dialect *Chen Zhouyu & Wang Maolin* (132)

Linguistic History

- A Summary of Some Kinds of Rhyme Chart of Cantonese Dialect Zhou Saihua (141)
- The Analysis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Grammars in the *Book of Chinese Grammar: The Art of Zhangzhou Dialect*—Comparing to the Chinese Textbooks of Min Dialect in the Modern Spanish Missionary Literatures Jin Mei (153)
- The Analysis on the Annotation Method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aracters in Yan Shigu's "Han Shu Note" (汉书注) He Yulan (169)
- Research on the Extra-lexical Etymology of the Vocabulary of *Shu Yu* (蜀语) Fu Xiangyun (176)
- The Study of Rhymes of Qin Guan (秦观)'s Poetries Yang yongya (184)
- Brief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e of "Middle + Noun" in the Book of *Shi Jing* (诗经) Zhang Xingxing (192)
-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Homophonic and Ancient Phonetics in 80 Years and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Dong Guohua (198)

Studie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Demands, Outline and Grading Criteria Establishment of Cantonese Proficiency Test Peng Yongmei & Gan Yu'en (203)
-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Vowel [ə] of Laibin Putonghua Accent Deng Hongli, Chen Mei, Luo Rongchang & Dang Wenfeng (210)
- A Study of Phonetic Metonymy Translation of Store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Zheng Wei (227)

Dialect and Literature

- Discussion on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of Sichuan Dialect on the Basis of the Dialect Script *zhua zhuang ding* (抓壮丁) Zhou Wei (232)

Information

-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Summary of Chinese Dialects in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war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Yanhui (242)

Index

- Total Contents of *South China Linguistics* vol. 15 Xiaoshan (243)

新型客家话、旧型客家话与早期南方高地汉语方言

柯蔚南 著 刘镇发 译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提 要】作者通过历史比较法，比较多点客家话、畲语等方言，并结合中国千余年来的历史演变，对客家话的形成提出一全新看法。作者认为在华南首先存在过一种早期南方汉语方言，后来由于逐渐有北方移民到来，低地的南方汉语被大面积取代，早期南方汉语只能在地得到传承，成为早期南方高地汉语。由于早期南来的汉人与畲族关系良好，这种高地汉语也逐渐为畲族所接受，最后被大部分畲族人口使用而逐步替代了其母语。这种高地南方汉语是畲族和客家人的共同祖语。由于生活方式有别，汉人拥有土地而认同新统治者，他们参加科举，语言中掺进了大量近代北方话，成为今天各地客家话的始祖。而畲族则保持他们的刀耕火种生活，并逐渐趋向封闭，和汉人互不认同，反而保留了较古老形式的早期高地汉语。由于他们曾在明代企图叛乱，被汉人政府打败后，散居到闽西和浙南，保留的语言并非畲语而是一种属于汉语方言的畲话。但没有迁出高地的汉人，也保留一种比较原始的客家话，作者称为“旧型客家话”，有别于在明末清初迁出高地的“新型客家话”。后者是现代汉语方言学中的典型客家话，亦即一般被广泛认识的“客家话”。由于旧型客家话跟新型客家话有一定差异，当它们被发现时，在分类和命名上也遇到了一定困难。

【关键词】新型客家话 旧型客家话 早期南方汉语方言

在20世纪，客家语言研究领域是颇为稳重而单一的。大多数汉语语言学学家都同意“客家”这个术语，标志着一个方言区的一般特征。但到了今天，客家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一贯看法，虽然熟悉这些变化的人只是少数专家。本文的目的是介绍这些新进展，特别是关于历史和比较语音学的部分。

一、背景资料

广东嘉应州的客家方言，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熟知的，尤其是瑞士巴色教会的人员。他们汇编了这些语言的词典和其他语文资料。他们编纂的词典的杰作，有MacIver 1926年编的客家词典，而其早期的1905年版本，多年来，在高本汉的一些中国历史音韵学作品中经常引用，例如，高本汉1915—1926

年、1954年的作品里。^①

嘉应州就是今天的梅州，包含被称作梅县的行政区。来自该地区的大量移民使其语言成为散布各地、密不可分的方言变体，其分布在中国的台湾到四川等地，在国外则从婆罗洲分布到曼谷。事实上，这些移植的语言品种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彼此之间能相互听懂，也与其历史原型梅县客语类似，增强了客家方言高度统一和同质的看法。

因此，现代方言手册通常将今天的梅县话，作为客家方言的标准和标志性典范。而这种语言的结构可以告知客家话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客家音韵的构造。在本文中，我们称这些“梅县谱系”的客家话为“主流客家话”。

通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方言学家的工作，实现了识别客家方言客观标准的精确和完善化。例如 Hashimoto 1973年的专著、丁邦新1982年的文章、黄雪贞1988和1989年的文章、Norman 1989年的文章等。罗杰瑞在其1989年的文章《什么是客家方言》中。提出了以下用于识别这种方言的方法：“为了确定一个方言是否客家，人们应该检查具有通音（鼻音或侧音）首字母的上声调词。如果方言真的是客家，那么这些词将分为两组，一组在阴平类别，另一组在阴上类别；一个音调或另一个音调的发生率将在词汇上确定……”

重要的是要理解本段中的“发生率”和“词汇决定”的意思。“发生率”基本上表示“发生”，即是否发生所需的音调配置。“词汇确定”表示所讨论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是两个相关音调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属于天赋和任意的音节。也就是说，它们不能通过任何外部标准来确定，例如，在切韵QYS中的特定初始，最终或音调类的成员资格等。实际上，它们是不可预测的并且是单词的固有成分。它们发生在哪里，并无其他概括可以解释。现在，为了在方言分类中使用这个选择标准的原则，自然必须有一个属于QYS低调域上声音节，两个现代方言类别的列表，即阴平和阴上。在Norman、Jerry L. 1989年的论文中提到，事实上，罗杰瑞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断定清单。

同样要注意的是，他将断定标准限制为次浊声母音节，并且事实上排除全浊音节。最后必须留意到，具体的方言不需要包含罗杰瑞列表中的所有断定音节，才被认定是客家话。^②其原因在于，具体方言中的这种音节的清单，可以通过来自其他方言或官话的借贷而被侵蚀。那么，人们所寻找的是在测定方言的大量案例中与测试库存达成一致，即一种“临界数量”的案例。^③掌握这种水平的断定精准度后，就有可能确定一种具有相当大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符合预期的客家方言。

20世纪70年代后，新的客家调查数据开始涌现。这包括对个别方言的大量研究，以及专门的方言专著——Sagart Laurent的*Les Dialects Gan*和两本主要的概要性巨著——李如龙、张双庆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和刘纶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这些作品研究的一些方言，并且按照上述标准被充分证实为客家话的，与主流客家的方言有很大差别，展示出了客家话这个家族在音韵上比想象的更多样化。这些新发现的方言许多都是在江西省（或福建的毗邻地区）。学者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地区的人都缺乏侨民的传统，或从梅县地区迁移出来的口述历史记忆。他们与主流客家在文化或种族上没有相关的自我认同，只认为自己来自现居地。今天这种类型的方言有时被专家称为本地客家话，因此，我们将其称为“本地

① 有趣的是，在高本汉著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中，他使用的客家话资料，最初的来源不是MacIver的客家词典本身，而是稍早一点，今天同一作者鲜为人知的作品，即中英文的客家索引，H. A. Giles的《词典》和S. W. Williams的《音节词典》，上海，1904年。

② 评估他标准的人总是不完全理解这个事实。

③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数量构成“临界质量”的问题在这里引入了主观性因素。不幸的是，这是现实世界对我们造成的不确定性。

客家”，将它们与主流客家区别开。^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客家研究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发展。1983年，易家乐(S. Egerod)发表了一篇关于广东北部南雄方言简短而重要的报告。这种类型的语言在那时通常仍然被称为地方土话(local patois)，并且被视为与中国主要方言群体在分类上未有定论。易家乐关于南雄的初步结论是，它基本上与闽或闽相关。2001年，沙加尔(L. Sagart)在一篇名为《南雄和客家》的开创性论文中，发表了来源于他自己实地调查的新的南雄数据。在那份报告中，他对易家乐关于这种方言可能为闽方言归属的理论提出了异议。首先，他注意到南雄方言中各种重要的“非闽”特征。然后，他继续指出方言中的各种客家式词汇项目。最后，他观察到尽管南雄的表层音韵结构，在各方面与客家表面不同，但它在更深层次上与相应的客家特征有系统的相似之处，包括与上述一些客观断定标准的微妙对比。换句话说，南雄不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客家方言，而是以独特和亲密的方式与客家话有关。因此，两者所出现的对应关系不能是偶然的，也不仅仅因为南雄是汉语方言的事实。因此，沙加尔的观点是，南雄和客家是密切相关的姐妹分支，源自一种常见的近源语言。

沙加尔关于南雄方言的结论，对客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其特别关注这种方言，还因为这些结论对被梁肇庭在1997和2013年的专著中称为“客家核心地带”或在其附近地区分类学上未分类的方言，在未来的研究方面有更广泛的指示。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含义：

与客家语言区域接近或毗邻的非分类方言，即使缺乏典型的客家式语音轮廓并且未能显示出公认的客观特征，仍应受到关注，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与客家一般的系统对应音韵，特别是具有上述断定特征。换句话说，应该确定它是否拥有与客家方言的“隐蔽”语音联系。

如果事实上发现了这种系统性的联系，那么必须考虑所讨论的方言，是客家群体的平行或姊妹方言的可能性，即它们是否从近似的共同来源发展而来的。

不需要或者要求我们发现方言间可能的系统对应，如与沙加尔在南雄发现的相同。实际上，这也不大可能。我们关注的是，是否存在任何直接平行和相似。这是因为如果可以识别这样的姐妹方言，它们可能已经从推定的共同来源发展为彼此独立地演化。我们应客观地探寻这种类型的所有可能性。

从20世纪末到现在，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 and 湖南东南部方言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庄初升等语言学家的不懈努力。这项工作的持续发展，产生了稳定增加的新田野数据，并采用了类似于上述南雄研究中开发的方法，以确定新的客家相关土话品种。

在其对南雄和客家方言的讨论中，沙加尔指出在客家话中，传统的QYS全浊系列的塞音和塞擦音(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在汉语早期阶段为浊音)清化为送气。在南雄，同一系列清化为不送气。如果根据沙加尔的观点，假设它们属于一个较早期的共同来源的前提下，再来比较南雄和客家话，那么我们必须假设该来源还有一个“第三系列”。非单纯清音或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此第三系列无论其实际的语音状况如何，都应直接与QYS全浊系列相对应。沙加尔同时指出，南雄在属于QYS阳上调一些字的发音特点，暗示他推测的祖源语言确实存在过阳上调，而此声调曾经是早期共同方言的一部分，尽管这个声调没有以独立声调的形式，存在于现代形式的客家。这点非常有意思，因为随后在广东北部和赣南发现的土话品种，其中一些方言具有完整无缺的阳上调，如沙加尔发现的南雄的情况，有间接证据指向这声调曾经存在，例如庄初升2004和2012年的论文中，以及张倩2014年的两篇论文；^②或者类似的比较发现，证实有整个全浊塞音和塞擦音系列，存在于假设的早期的源语言(如郭必之2005年的文章，庄初升

①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赣南客家方言确实具有移民传统，并且似乎反映了后来从主流区域的回迁。这种类型的语言明显地通常称为广东话或其他类似的名称，而不是本地话。

② 应该指出，易家乐研究的南雄品种实际上确实保留了完整的阳上调类，不像沙加尔、庄初升和其他人研究发现的品种。

2004、2007、2008年的文章,以及张倩2014年的学位论文中皆有提及),即在共同汉语方言阳上调,至少在某些音节类存在,尽管在现代形式的客家话不存在这样的独立声调。

这些类型的发现清楚地表明,所讨论的土话品种要么保留实际古老的客家特征,要么为这些特征的早期存在提供间接证据(如全浊初始类型的情况)。一些客家专家对这种古老方言类型的命名,即“老客家话”。而且,作为对此用词的补充,迄今为止的习惯用语“客家”(包括主流和本地)则称为“新客家话”。

笔者建议的英语词汇分别是Paleo-Hakka(旧型客家话)和Neo-Hakka(新型客家话)。笔者在这里避免使用“Old(古/老)”这个词,因为在英语中“古/老”作为语言名称的限定符,指的是最古老的书面或文本证明形式的语言。例如,古英语、古挪威语、古高地德语,旧型客家方言是现代口语而不是古代方言。我们使用“neo-”与“paleo”相配,因为与希腊语前缀“paleo”相关的英语用词也应该是希腊语“neo-”。总而言之,以前我们只谈过“客家”,我们现在应该把汉语方言学家称呼的客家话称为“新型客家话”,而无可争辩地跟客家相关的土话品种,则使用“旧型客家话”这个称谓。

这里必须解决客家研究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畲(旧称畲)话方言在汉语方言的分类。畲话是一种客家话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如Norman 1986年的文章中有提及,但这种观点尚未被普遍接受,如游文良2002年的专著中有提及。最近,中西裕树(Nakanishi)在2010年的文章中证明了畲话与客家话有着共同的创新。他将畲话与更广泛的客家方言家族(即新型客家话,Neo-Hakka)结合起来,还发现了畲话方言拥有独特的共享创新,这些创新在新型客家话中找不到。这表明它们跟“传统的”新型客家群体,在分类定义上有整体的不同。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重建的共同或原始畲话(如邓晓玲2013年的论文及Coblin的论文手稿2)与共同新型客家话比较(如Coblin的论文手稿1和手稿2所提及),很明显后者不可能是前者的祖先。原因是共同畲话拥有现今新型客家方言中所缺乏的语音特征,而其也无法从共同新型客家话^①中预测出来。这说明现在称呼的畲话和新型客家话,应该被视为一个较早的近端共同祖先所生的,两个非常相似的女儿。中西裕树将这个共同实体,视为他新提出的共同客家话。笔者的观点是,目前所称的畲话和新型客家话,来自一个较早的共同客家—畲话原始语。我们与中西裕树的立场差异,主要是命名而非实质。共同客家话—畲话,中西裕树可能会称为共同客家或原始客家话,这对他来说必须分成两个分散且有凝聚力的分支,其名称为畲话和(也许是)“非畲话”。这些“非畲话”将直接对应于我们现在称为新型客家话的语言。但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与中西裕树均应将这些语言的研究视为比较问题。也就是说,中西裕树在畲话方言确定的独特创新,应该首先相互比较来找出一个共同畲话。而新型客家话(或“非畲话”)方言必须以相似的方式进行相互比较。然后将两个重建的分支系统,相互比较以得到两者的共同祖先。我们赋予该祖先的名称最终是个人偏好的问题,从方言系统发生学和比较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次要的。在本文中,笔者将称之为共同客家话—畲话。

“畲”一词源于汉人的他称。99%的畲族人在自我介绍中使用的最常见的自称,是[san¹haʔ⁷]或[san¹haʔ⁷ŋin²]的一些变体,相当于现代标准中文“山客”或“山客人”,简单地说是“山区的陌生人或外人”的意思。^②在本文中笔者关注的是这些人的语言。

其余1%官方指定的畲族人口,自称名为[ho³³nte⁴²] (中文:活聂),意为“山人”。他们讲一种苗语语言,住在广州以东山区的九个村庄里。笔者选择在这里称他们为“活聂”。官方认为活聂属于畲族,

① 柯蔚南(Coblin)已经系统地证明了这一点(可参见其2号手稿,第6章,第6.3节)。

② 当然,在特定领域还有其他的地名。例如,仅在广东,我们就会发现以下几个:山子、“登山者”、山人、“山人”、住在山里面的人,以及“讲畲话的人”。

尽管两者都没有任何本土传统文化让这种联系合理化。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互相支持这种联系，或者声称他们是基于1956—1958年的民族普查结果。但是，相关文献中没有给出该实体产生的，任何严格民族志报告的准确参考。笔者至今仍未看到这些声称畬族与活聂相关的种族论述。换句话说，在撰写本文时，关于山客/活聂的真实证据的文字记载也付之厥如。虽然偶尔有反对声音，但官方立场在中国很少受到质疑（如雷先根2003年的著作、邓晓华2005年的论文以及刘婷玉的毕业论文有提及。在中国以外，对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甚少（如Niederer、Ratliff、Jerry Norman、Coblin等的论文有提及，特别是Nakanishi and Kwok的文章）。笔者的观点是，这些关系在民族学和语言学上都很难得到证实，应该持怀疑态度。如果确实存在直接的活聂/山客文化联系，那么它仍然需要在中肯和令人信服的情况下得到证实。

二、历史模式

在第一部分笔者鉴定了新型客家、畬话及旧型客家是语言学上相关的实体，新型客家和畬话被认为非常接近，而旧型客家话则相对疏远。所有这些实体都与沙加尔的假设一致，来自一个较早期的祖语，而笔者目前没有给它正式名称。新型客家和畬话都是有效的系统发展类群，由通过独特共享创新相连接的方言组成，因此构成了更高分类群下的节点，笔者称之为客家—畬话。另一方面，旧型客家方言必须被视为一个副系群的个别分支，而不是一个有效的分类群。换句话说，就目前所知，没有单一的共同创新所描绘的单一的旧型客家分类群。

为了将上述假设提升到更具体的水平，我们需要一个历史框架。也就是说，一个人口统计和迁移历史模型，将我们迄今为止抽象的类型学表述，与所接收的文本内容相协调。要在此详细开发这个框架，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研究。在这方面，笔者将利用先前提出的框架，准备了两篇文章，即柯蔚南2015年的文章及其的一份手稿。^①在准备这些作品的相关部分时所参考的许多来源中，有三个特别有用，即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在1993和1997年的专著以及梁肇庭在1997和2013年的专著中有提及。笔者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勾画出发展模型的预示版本。任何这样的历史模型当然都是假设的，可能会被修改，甚至完全被否定。但是，如果要将语言数据和历史证据，合并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语言历史图景，那么这种类型的假设是必要的。

（一）初始时期

华南地区的大规模汉人渗入，可能始于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前259—前210）发起的五军50万人远征。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一支10万人的力量，他们从赣江流域向上移动到最南端，占据了现代的赣州和南康所在的交叉支流山谷的区域。他们从那里夺取了横浦通道的控制权，并越过了该范围以南的区域。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占领现在的江西、福建及广东和某些毗邻地区，并且在山区内部驻军。我们称之为“南部高地”。这些前哨不仅有常规的军衔部队，而且还有军事农业殖民者（屯兵）。在随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前202—220），一个非常相似的驻军系统得以维持。此外，赣江流域和南部高地，也被平民移民以缓慢但稳定的速度开发。这些新移民普遍喜欢在盆地肥沃的平原上定居，我们称之为“中南部低地”。后来，由于这些地区最好的土地已被占用，新移民进一步向上游进入南部高地。人口历史学家认为，参与这些运动的中国移民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那些到达高地的人仍然在那里构成了一个汉人的多

^① 目前，这两件作品中只有第一件正在印刷中。但是，第二个是作者以电子形式提供的。

数,超过了已经居住在该地区的原住民。

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的融合》一文认为,各种证据表明新来的汉族高地人与土著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和平相处。然后谁组成了这个土著人口呢?首先,很明显它们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非汉族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中国的资料来源中,会使用越和蛮等术语来表示他们,这些术语是因为汉人视他们为非我族类而使用的。其次,从我们对它们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是多样的,由汉人认为不同的群体,而不是单一的语言或种族实体组成。第三,他们据说包括部落或扩展的氏族群体,而不是汉人的中央统治、高度结构化的政体。第四,他们至少部分是迁徙而不是在中国模式上固定不动。而且,最后他们依靠混合的轮歇耕种、狩猎和采集,而不是中国式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家。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南部高地的“原住民(Indigenes)”。

公元316年西晋朝代的沦陷,引发了传统历史学家称的“永嘉之乱”。这场动荡对人口和语言产生的后果持续了大约150年,并且显著影响了长江以南的东部地区。然而,它们对中部或江西地区的影响似乎很小,因为这里的迁徙只影响了最北端,沿着长江南岸的边缘移动,实际涉及的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在南部大部分地区发生的事情,似乎只是长期、稳定、涓滴的渗透,延续到最佳可耕种的平原地区,并且从那里又有可能继续进入高地。

笔者认为,在迄今处理的时期内,高地汉人和土著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总的来说是友好的。这种推断源于后来的畚族人的后续语言和文化特征,他们被认为是土著的后裔(如李默1993年的论文,施联朱1987年收集的许多类似研究等都有所提及。^①这里设想的共生的本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记得,进入高地的汉人移民到达时,他们不是“真正的”高地人,而是移民的低地人,习惯于耕种肥沃且易于灌溉的平原,并在那里种植低地栽培品种的农民。南部高地与这些人熟悉的地方截然不同。这些新土地森林茂密,气候比平地更干燥、更凉爽。

此外,高地的土壤与移民以前耕种的土壤根本不同。另一方面,高地是土著的主场。他们在高地森林清除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并且对土壤类型、最佳种植时间,以及在高地地区茁壮成长的栽培品种具有深入的了解。土著的监护对这些新邻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他们来说,高地汉人从北方的土地带来了比迄今已知的、比土著更高水平的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那么,双方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大量土著从他们自己的非汉语言,转变为高地汉人所说的汉语形式的可能性。

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呢?当然,它必须是某种“中古前”的汉语,正如大多数在相关时期移居长江以南的农民所说的一般。一开始时它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连续体,从赣南盆地向南延伸到南部高地。正如下文所示,它几乎肯定具有与华东发现的,即现今南部的江苏浙江和福建的旧方言不同的特征。它与西部湘江流域的西部汉语类型有何关系,这更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工作中,我们暂时称之为“早期中南汉语(Early South Central Chinese, ESCC)”。在这个早期阶段,它从北到南的多样性是一个有趣但令人困惑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地理和地形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北部低地或平原品种,和一个南部高地类型,即我们的早期南部高地语言。低地品种后来大部分灭绝,并通过连续的北方移民浪潮取代,详情如下所述。高地类型表现较佳。从第一个秦时期的军事农业殖民者到六朝和六朝时代,后来相继和语音更发展的语言类型,必定已经到达高地,并被聚集到那里正在发展的语言熔炉中。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区分和分级的明确证据,但实际上其可能性极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南方高地人民的早期形式视为单一实体。那么,这将是南方高地汉人和六世时期的土著居民所说的汉语。

^① 在这方面,另见Leong Sow-Theng的*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的介绍,以及第31—34页的内容。

(二) 中古时期

从唐(618—907)的后半期开始,一直延伸到宋朝(960—1279),中国人口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一方面永远改变了赣江流域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南部高地的社会和民族构成。

第一次剧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南部迁徙浪潮,始于安史之乱(755—763)。这次灾难导致中国北方人南迁的大规模人口混乱,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在葛剑雄等人确定的迁移流中,我们在这里需要直接关注的,是一个广泛的东南流动的难民,穿越下游的长江流入南部的江苏、浙江北部和安徽南部。当时许多移民留在这些地方,但更多人继续向西进入鄱阳平原。他们要么在那里的不同地方定居,要么在赣江以南更远的地方进入吉州(即现代的吉安)区域,以及继续走到流域的南端。这条主要河流的一部分也是较小的一条,直接从长江中央江淮地区穿过长江流入平原,当他们向南推进时便加入主流的移民。这些进入江西的行动被认为是相当沉重的,必然会对该地区的人口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1993和1997的专著有提及。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下游流域的最佳地区被占领,相当数量的移民将更进一步进入南部高地。

第二次的大型南部移民浪潮,始于1126年北宋朝(960—1127)亡于女真族(金)入侵者,引发了“靖康之难”,并显著影响了江西和邻近地区。这些事件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出中国北方,从入侵初时开始,并在随后的南宋时期持续,在女真人入侵期间和之后,都有大量的北方人迁移到江西(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1993和1997的专著有提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史之乱时期广泛的人口流动的再现,并再次将新的北方移民投入南部高地。

安史和靖康之乱的迁徙浪潮,导致了赣江盆地的早期人口被淹没,使北方早期中南地区的移民语言,几乎完全取代了低地早期中南汉语,侵蚀后汇聚成一种新的方言类型。在笔者看来,这些事件是称为“共同赣语”的主要起源,是演变为现代赣方言的祖语(Coblin, 2015)。^①来自北方的同样移民浪潮,最终导致南部高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加和压力,现在我们必须考量其社会和语言效应。

事实上,谢重光在他的文章《畬族与客家的早期关系史述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笔者据此得出以下总结。在九世纪中期,即在安史迁徙时期的后半期,中国历史开始报告越来越多“野蛮人”(即夷僚,后来称僚或者蛮僚,稍后还有山僚和峒僚)的叛乱和抢掠。这些都是当时对非汉人的传统术语,而谢更引用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统领的姓氏,表明有关群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可以鉴定为畬族祖先的人,即现代畬人的祖先。

随后,从南宋时期(1127—1279)开始,历史资料证明了种族间冲突,和社会不和谐事件数量的另一次飙升(尤其见谢重光2007年的文章中有提及),并一直持续到元代初期(1271—1368)。这直接对应于靖康迁徙的时期。有趣的是,与福建南部的宋代有关扰动,则在历史上首次用“畬”这个词作非汉反叛分子的名称。

我们认为,理解上述事实的关键,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对此的态度。对畬族而言,他们是半迁徙的适应刀耕火种的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清理土地后耕种数年,然后再将其放弃、回归自然。最终这当然会恢复土地的肥沃和实用性。但他们并无个人合法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或习惯概念,因此不可能将他们登记为土地所有者,并根据中国惯例对他们进行税收评估。

南方高地汉人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最初来自长期稳定的农民社会。笔者认为,当他们清

^① 正如我们下文第二部分中再次注意到的那样,这些方言确实保留了少量残留的底层元素,形成低地早期中南汉语,特别是在赣南地区。

理土地,准备种植土壤,并选择最适合他们新的高地田地的特殊高地作物的经验,受益于畚族祖先的监护。但同时他们会与这些非汉人导师分道扬镳。对于高地人来说,一旦他们清理了一块土地,就会永久停留不走。由于他们在培育耕地和通过添加肥料来维持其生产力方面,拥有数千年的经验,因此他们田地产量纵然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也不会令他们感到担忧。他们会快速且多样化轮换他们的品种,来保持其田地的最大产量。因此,当他们在一片土地上定居时,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土地,而不是别人的。但不可避免地,官方迟早会来登记土地,并开始以具有悠久历史且传统的方式征税。

因此,纵使土著使用和占有土地的观念和汉人的截然相反,畚族祖先和高地汉人仍然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在唐前和唐初时期的高地人口密度低,据我们所知,它们的共生关系是稳固的。然而,由于安史和靖康迁移潮,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涌入扰乱了这种均衡状态。来自中原的低地汉人大量涌入,也会导致这些新移民与现有的中国南方高地汉人之间发生摩擦。原因是可耕地的竞争激烈导致,也由于新移民和南方高地汉人间,在语言文化上彼此不同而加剧。这可能导致摩擦,最终是两个汉人群体之间发生武装冲突。随着利益和敌意的减弱,联盟发生了变化和演变,导致传统历史资料中出现了“叛乱”和“山匪”的复杂情景。

(三) 高原过渡期

南部高地竞争团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持续到明朝(1368—1644)。在此期间,他们演变为华南地区各种晚期前现代和现代文化与语言结构。

从特定的汉语群体开始,梁肇庭在书中指出,高地的敌对对抗一直持续到15世纪,而政府直至1485年仍采取积极镇压暴力措施。但这并非全部如是。在元代和明代早期,即梁肇庭界定为“潜伏期”的期间,较早到来的南方高地汉人和较晚的迁来的汉人移民也进行了磨合。随着敌对行动平息,旧的怨恨首先被新兴的容忍所取代。最后,通过友好、通婚和积极的语言融合而消除。因此,梁肇庭提到的部分“潜伏期”,涉及操南部高地汉语、早期开发南方高地的汉人,与后来具有后来北方型语言形式的新移民融合。由此产生的共同语言有一个古老的底层,在其上覆盖了连续的后来的词汇层,这些词汇层与安史、靖康时期移民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征。结果是所有高地的汉人都使用了一个层次上非常复杂的共同语。除语言外,还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融合。来自高地人的一些元素,反而是在他们来高地之前,最早的汉人定居者的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其他的元素则是为了应对新的高地环境而产生的。许多研究,如在施联朱等学者的作品中^①也有人提出:在这个早期阶段,肯定会有从畚族祖先借来的某些非汉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后来的、来自长江以北的晚唐和南宋时期移民,也带来不少文化特质。最后的结果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南方高地汉文化,其个性大致源于其独特的形成过程。

现在转去看畚族祖先。我们能够辨别出两个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当时经济和社会压力的互补反应。一方面,与高地汉人一起时,许多畚族祖先转为内向,远离汉人。他们尽可能自己抱团,继续讲自己的早期南方高地汉语的古老形式,很少受到新迁来的汉族移民的语言影响,并尽可能与所有外来者保持距离。但是,在接触是必要或权宜之计的地方,他们坚持接触,在任何必要的程度上掌握南方高地人不断演变的汉语方言作为第二语言,并在必须与他们的汉人邻居沟通时使用这种语言。另一方面,梁肇庭认为,在接触激烈的地方,他们比以前更加猛烈地反击,以致畚族与汉人之间的暴力变得更加激烈。

^① 邓晓华:《论客家话的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3卷第4期,第143—146页。

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17—129页。

总之，过渡期的特点在汉人的一面是“潜伏”，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汉文化类型，伴随着一种随之而来，新形式的多层次高地汉语语言。在畚族祖先一侧，则排斥和避免与汉人的接触，并继续使用自己的、相对保守的高地方言。这是一种在许多代祖先以前，以早期南部高地汉语的形式，替换了他们原来的非汉语语言。正是南部高地人口动态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引起了曾经是中国高地汉人和畚族祖先所说的古代南方汉语的基本分化。

(四) 迁移和散居的晚期

对这一时期的详细研究及其所包含的迁徙运动，实际上是梁肇庭开创性著作《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种族》的主要内容。笔者已经多次提及这本书。对它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对方言发展的影响，笔者将以简短而有限的方式讨论它。从汉人南方高地开始，大致上1530年已经标志着华南经济开始上升，直到明末清初的新下降周期（1644—1911）。在经济改善期间，南部高地汉人开始离开家园，往河流流经的东部沿海和岭南地区的流域移迁。他们希望在那里发现和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和资源。在向下移民到较低的地区时，他们倾向于停留在地形上更高的区域，而不太愿意去已经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在这些山麓地区，他们充分利用了在高地得到的土地清理和耕作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他同样获得的高地技能，如采矿、采石、伐木和采药。他们定居的土地，如果仍然是无主的，可以简单地占有；或者，如果已经被拥有的话，则需从低地地主那里廉价租用，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耕地，不可能进行湿地种植而具有很小的经济价值。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高地汉人拥有独特的，在他们的南部高地家园已经发展了许多代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点立即被低地人注意到，他们称他们为“陌生人”或“外人”，即客家人、客人或客民。因此，严格地说，在这个时期才开始我们可以合法地谈论“客家文化”或“客家语言”。^①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时期，一个独特的“客家人”的概念只存在于低地人。没有证据表明，高地汉人移民这样认为自己。换句话说，使用梁肇庭的指导方针，他们已被确定为拥有一个可识别的族群。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没有移民的高地人在前现代时代，从未被认为是“客家人”。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就像他们今天一样，只是本地人，“这个地方的原居民”。相反，现代语言学家和方言分类学家，通过比较方言学研究，选择称呼他们和他们的方言是“客家人”“客家话”而已。

当华南经济再次下降，并最终在1700年左右达到谷底时（如梁肇庭1997年的专著有提及），为了竞争正在减少的资源，客家人与低地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客家人的高地农业和伐木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了下面平原的灾难性洪水和其他破坏。这些因素的结合最终引发了客家人和低地人之间的冲突。一个全面的客家民族意识出现了。从这一点开始，我们终于完全有理由在其现代意义和应用中使用“客家”一词。

如上所述，为了避开与中南部高地的汉人的冲突，畚族祖先退出与他们的对手的接触。后来，他们从高地大规模外流。这种人口分散是我们所说的“畚族散居”。笔者认为，它标志着从南部高地的“畚族祖先”阶段，向现代或“今日畚族”阶段的过渡，其轨迹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且仍然存在。散居者沿着两条相当不同的路线离开高地。也许最大数量的畚族向东南移动到广东东北部。从这里，许多人向北迁徙到沿海的福建。然后一些继续前进到浙江南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远到北部和西北部。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汉族人之间进行了交流，但他们总是呆在自己的村庄或小村子里，在那里他们成为汉人模式的定

^① 李默《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第129页对这一点进行了出色的讨论。